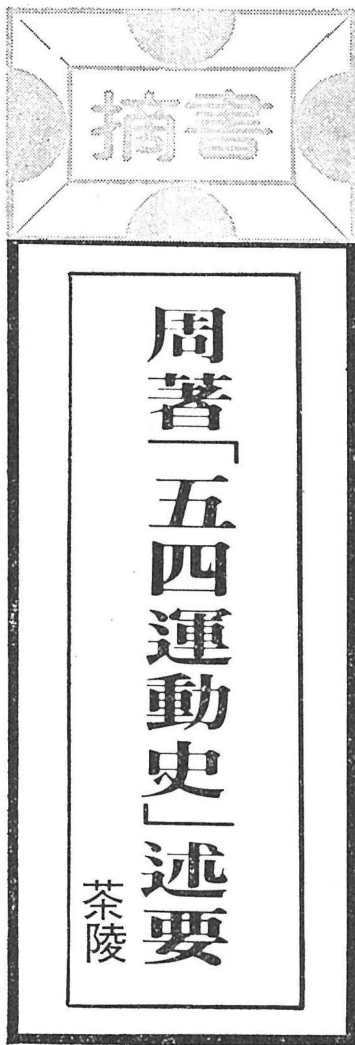


更進一步的發展（上）

當商人、工業家和城市工人於五月後與學生結為一體時，形勢逐漸改變了。這個聯盟受到六月初政府大捕學生的刺激而形成，並在上海及其他各地開始以罷市罷工的方式，明白展現出它自己。

這個反抗政府的聯合陣線，是在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空前有利的環境下造成的。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，就是如繼起諸事所顯示的，一股似為日本和中國政府忽略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浪潮。另一因素特別與抵制日貨及商人罷市有關，就是一次大戰期間發展起來的中西經濟力和日本利益的衝突。

北京政府受到學生罷課的困擾，初表露了有意在小問題上和學生妥協的訊號。但它也圖避免做出任何事以



激起日本的反對，並傷害到當時是實權派的親日軍閥。五月二十一日錢能訓總理在一項聲明中，答覆了教職員聯合會代表們有關學生的要求：一、政府沒有足夠的證據，依法不能處分任何官員，或以叛國罪加以審訊和起訴。二、政府不能公開宣布拒絕簽訂巴黎和約，否則將有害於它與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，但政府會審慎考慮這問題。三、已拒絕接受蔡元培的辭職，然傳增湘雖經政府的試圖挽留，其辭意仍堅。四、對於上海和議，北方代表將不撤回，談判之門永遠開放。

學生們對此答覆並不滿意，他們更怒知了三名親日官員曹、陸、章已被留任，親日的政策亦未改變。政府對其他要求的漠視，疏於回答和履行的態度，也同時激怒了他們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日本開始插手干涉此種局面。五月十八、二十、二十一日，日本駐華公使小幡酉吉向北京政府三致抗議，要求鎮壓所有的學生反日活動。繼之而來的是日本駐軍的武裝示威，日艦沿着天津、上海、南京、杭州及中國其他各港聚集演習。在這樣的威脅下，北京政府開始企圖以武力來撲滅學生運動。首先，它想要撤換警察總監吳炳湘之職，但因北京商會的反對而未果。然後，五月二十一日，步兵統領李長泰遭撤職，他與吳炳湘同被保守派疑為同情學生。取代其職的是王懷慶。五月二十三日，政府禁止北京學生會的報紙「五七日刊」出版，該會的其他刊物如「救國」遭到同樣命運。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發行的秘密刊物如「進化雜誌」、「工人寶鑑」、「太平」及「民聲」，也都被沒收查禁。此外十一種傾向學生的報紙，如「益世報」、「北京晨報」和「京報」等亦復如是。五月二十五日，教育部命令全體學生在三日內返校上課。與此同時，政府計畫以三步驟來對付學生：一、用武力干涉學校的行政；二、解散學生組織；三、遣警到校強迫學生簽字答應上課，拒絕者將被開除。結果，學生們無視復課的命令，北京的教師們也立刻向政府抗議，威脅說假如政府採此激烈手段的話，他們會集體辭職。

面對這樣的反抗，政府的行動緩和了。它允諾暫時取消武力干涉的計畫，但要求教師勸導學生們返校上課，教育部也派員與學生談判。其他溫和的方法也被用來改善形勢，教育部次長袁希濤建議提早一個月開始放暑假，以便藉此解散學生。後來高等師範和法政專校果然提早放假。可是在這樣緊張的局面下，學生幾乎不可能

被解散。另一項建議由安徽省長呂調元提出：立刻對所有學生開放一種特別的文官考試，網羅一些有能力和抱負的學生進入政府部門，以求削弱學生運動。政府顯然被這新奇的觀念所感染，於是開始計畫推行。這個建議雖然多少有些天真，而且實際上不够具體，但反映出當時已被人感覺到的一個社會問題，即本書第一章中所指的，自從舊科舉制度廢除以後，不見新的人事補充制度起而代之。時逾十載，新知識分子依然找不着正常的管道，以便通過它而進入政府機構，如傳統所指示的，此仍爲他們生活的理想。這是一個存在已久的問題，但若說學生運動的直接動機是要入仕，則屬錯誤之見。一種健全的人事制度或有助於年輕的民團慢慢重建起一項社會平衡，但此類急遽的開放姿勢，對阻止肇始於許多複雜因素的風暴而言，收效甚微。

不過，政府謀與學生妥協的努力並非完全白費。北京學生起初的活動是在強調反日演說，約有三千人每天在街頭工作。後爲避免引起對日外交的困難，他們放棄了大團體的全力演說，改採個人或小團體的演講活動（主要是組成十人團），並且提倡購買國貨。他們爲中國工業家和販賣國貨的商人擔任義務推銷員，並將城裏市場和生產狀況做過一次徹底的調查，列舉了數逾八十的本國工廠及公司，能够製造而取代通常由日本購入的貨品，諸如草帽、奢侈品和辦公室的供應物。他們向所有的商店推薦這份表冊。學生們的工作包括市場、價格的研究，以及探討許多經濟改革的可能性。許許多多有關的小冊子和傳單印發了出來。他們的行動變得集中而緊張，但是十分有秩序，性質也是和平的。

北京政府因有一個親日的集團在後，決意在學生情緒表面上似乎稍緩時，強力鎮壓這種無法容忍的活動。六月一日，徐世昌總統頒發兩道命令，一爲贊許曹、陸、章，說他們有功於民國，二爲指控學生破壞公共秩序及安全，訓誡他們立即返校讀書。同時宣布，學生聯合會和學生義勇隊等組織將被查封，首都正式頒布戒嚴令。

嚴厲政策的恢復，顯示在六月二日下午對北京東安市場販賣國貨的七名學生之逮捕。學生們被觸怒了，聯合會在當晚開會，決定擴大他們的工作等級，第二天發動每組五十人的演說隊。他們不提及對日貨的任何抵制

，但是倡導愛國主義，並勸市民購買國貨。假如五十名演說者之一被捕，其餘就全體陪他入獄。

六月三日早晨，九百多名（有些報導說約兩千名）學生持白旗展開沿街演說，每組從十人到六十人不等。城裏的巡警增加了數倍，保安巡察馬隊奔馳於途，他們試着驅散學生和聽衆，結果有許多學生和旁觀者被馬或警鞭所傷。學生聯合會立刻拍電給上海的報界，報導上午已於一百七十八名學生被軍警所捕。下午時被捕人數增至四百，首都的監獄不堪負荷，政府乃將北大法科的大建築臨時改變用途，前門標貼「第一學生拘留所」字樣。北京學生聯合會致電上海報界說：

今日（六月三日）學生遊行講演，各校之出發者九百餘人，被捕者一百七十八人。北京大學法科已被軍警佔據，作爲臨時拘留所，拘囚被捕學生於內。校外駐紮兵棚二十，斷絕交通。軍警長官，對於學生，任意侮辱，手持國旗，軍警奪而毀之。講演校旗，亦被撕擲。其堅持國旗與校旗者，多遭槍斃。受重傷者二人。旋被送入步軍統領衙門，榜掠備至，尙不知能否生還。此外馬隊之衝突而受傷者亦多。東華門外有一軍官對學生曰：「吾係外國人。」其顛預昧良，有如此者。學生等文弱，拘囚榜掠，任彼軍警之所爲。一日不死，此志勿奪，殺賊殺敵，願與諸君共勉之。北京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叩。着。

六月四日，天津發出一通電報到上海，報導了六月三日的北京局勢：

昨日（六月三日）上午十時，北京學生大演講，被軍警拘捕，現閑置譯學館四百人；斷絕糧食，四周架武器，設帳圍圍。又二人被步軍統領拘去，管刑錄鑄下獄。未捕者連日仍續演講，以示決心。並電各省縣學生、各界，火速營救。

杜威及其夫人也於六月四日從北京報導說：

今天早上十一點左右，當我們開始找房子時，看到學生在演講，稍後聽說他們已經被捕，他們口袋裏裝著牙刷和毛巾。有些人說被捕者不止兩百，而是約一千人。單單北京就有一萬人左右示威。

儘管有人被捕，學生們並未放棄，街頭演講愈演愈盛。到了六月四日晚間，政府手中已有大約一千一百五十名的學生犯。北大理科的建築物成為第二臨時拘留所，文科也被軍警所包圍。面對武裝報復的威脅，學生們不但沒有顯示出退讓的跡象，反而加強了演講的勇氣。六月五日早晨，有五千多人在街頭演說。每一條街巷，以及公園和市場，都變成羣衆大會處。他們站在箱子上帶淚而談。北京當局不能再事拘捕，只有驅散那些頗受感動的聽衆。

學生最初入獄時都很受苦，大約有七百名士兵在看管他們，第一天沒有食物，六月四日清晨四時才發寢具，受傷和生病的人在獄中全未獲得治療。

政府這種苛行引起全國的憤怒。女學生們也挺身而出，加入抗議的行列。六月四日有一百多人在街頭演說。次日，來自北京十五所女校的一千多名學生集會，然後整隊前往總統府，抗議對待學生如盜匪，並拿校舍當監獄，她們要求釋放被捕的年輕人，而且要求言論自由——這項行動在中國是史無前例的。

教師們也出來援救學生，致送了食物和毛毯。八名北京教職員聯合會的代表（包括一位滙文大學的美國教授在內），「攻進」學校拘留所慰問被捕的學生。各學院和大學的行政工作人員也像女生一樣，抗議教育機構被變為監獄。六月四日，北京基督徒決議讓出他們的講壇，改為學生的演講台。

當被捕學生慘況的報導公諸於世以後，立刻引起反對政府的怒潮。數以百計的人士，與來自各種組織如「國民外交協會」、「女學生聯合會」、「和平聯合會」和「紅十字會」的代表，每天到監獄慰問學生，提供食

物和其他援助。不過，學生們拒絕了所有的金錢捐獻。此時政府受到各方猛烈的抗議。

大逮捕造成了中國所有城市的憤怒情緒，其中以上海受到的刺激最大。商人、工業家和城市工人，因受此次騷動的影響，以雖或有限但聯合一致的行動，追隨着新知識分子的領導。新知識分子也因與新社會及經濟力量有過短暫的蜜月，開始體認到他們想更進一步的成功，要靠以改變中國經濟和社會為目標的徹底的羣衆運動。這些趨勢顯示在六月五日的大罷市中，標誌出五四運動傾於此種新方向的轉變。

六月一日在與學生代表的會晤中，商界領袖答應以行動支持學生。二日當政府展開大逮捕時，學生代表再度造訪上海縣商會負責人，敦勸他們立刻採取行動支持學運。但是當天正值端午佳節，生意忙碌，商界領袖乃排定次日開緊急會議。六月三日下午五點，會議在城市南方的商會會所舉行，上海學生領袖何葆仁，北京學生代表許德珩、黃日葵、段錫朋和陳寶鏐，在會中演說要求上海商人繼續抵制日貨，以抗議政府的內外政策，假如政府的反應不良，就停止納稅。

六月四日下午，上海學生聯合會在收到天津拍來有關北京大逮捕的電報後，立刻展開了一個更有力的運動，尋求工商界的支持，大逮捕的新聞號外和傳單也立刻發出了。下午七點後，學生們戴着白布帽，在每一條街道上發表激昂的演說。特別是在城南，他們訪問所有的商店，要求簽字答應從次日開始罷市。幾乎所有被訪者都予響應，紛紛貯購食物以待即將來臨的事件。學生們在午夜以前，尚未被武裝警察所驅散。六月三日日本駐上海的總領事和六月四日北京的一家報紙，都已預言六月五日上海將舉行罷市。

罷市果然在六月五日上午開始。黎明時學生就恢復了他們的街頭演說。清晨起城南的商店都未開門，這項運動迅速蔓延到毗連地區。大約早上八點，靠法租界的街店加入了罷市，一小時後法租界本身也受到傳染。上午十到十一點，公共租界裏的英美租界亦然。罷市像野火般向北擴大，中午時分已涵蓋了整個城市，稍後又及於郊區。各種商店全都歇業，包括遊樂場所和飯館。一些外國商店是僅有的例外。這意味著在幾小時之內，一座擁有一百五十三萬八千五百人的城市，被一項臨時組織不周密的罷市所攫取，以支持一萬三千名罷課的學

生。

罷市帶給上海市景象的蕭條，非西方人所能輕易想像到。中國大部分的商店沒有西式的厚玻璃門窗，關門時就拿厚木板拼上，看來似乎是為抵抗軍事圍攻而設計的。結果當大多數的上海商店同時關門時，該市像在預期敵侵或革命。事實上其間除了兩百多名街頭演講的學生被軍警所捕外，罷市開始的幾天內，諸事都進行的井然有序。學生們迅被釋放，局勢也安靜下來。城市並未荒蕪，相反地，街上擠滿了更增的羣衆，聆聽學生的街角演說。白紙的告示貼在全市商店的門窗上，內容包括「商學聯合，救我中國」、「還我自治，釋放學生」、「不誅賣國賊不開市」、「至死在獄，吾人奉陪」等這些口號反映出商人在某些程度上漸升的民族意識和自願望，他們醒悟到需要和新知識分子聯合一致，以抵抗侵略和壓迫。

六月五日下午，在上海學生聯合會的邀請下，社會和政治各團體代表兩百多人舉行會議。出席的商業、社會和政治領袖有虞和德、黃炎培、蔣夢麟、葉楚傖和張東蓀等，學生有段錫朋、許德珩和朱承詢等，復旦大學的何葆仁主持此會。代表們一致決議繼續維持罷市以支持學生，並成立一個包括商人和勞工組織、報界和學生聯合會的永久性機構，該機構名為「全國各界聯合會」，亦稱「工商學報聯合會」。英文的「字林西報」報導說，在這次會議中，「好幾位發言者強調罷市不是一種排外運動——甚至日本也在內。所有到會的人要從事勸告他們的朋友，協助維持和平與秩序」。隨後的幾天，聯合會舉行了一連串會議，支持商人罷市和工人罷工，以及其他羣衆運動。後來聯合會在十一月十日正式舉行成立大會，來自所有省分的一千兩百多名代表參加了典禮，其中包括政治領袖如黃大偉（代表 孫中山先生）、章太炎、黃炎培等。

這次罷市有三個主要團體涉及：店主、店員和學生。學生透過他們的宣傳活動，在社會事件和公眾情緒上的影響力當然是巨大的，對罷市的重要性也無可置疑。他們贏得了多數人的同情，包括店員和商人兩者。五四事件以後，上海各商業組織就拍過若干電報給北京政府，內容已有利於學生。六月二十四日杜威從北京報導說：「有許多的事實證明，學生在爭取商人上實已成功；他們不再孤立，產生了一項聯盟，無論攻守都與強有力

的商會同在，他們還談到罷稅問題。」

杜威的報導正與上海外國租界當局的意見相反。六月五日罷市以後，後者轉變了他們原來傾向學生的態度，指控學生強迫商人歇業。然而除了少數的例外，沒有紀錄可證商人在抱怨被迫行動。

的確並非每一個中國商人都支持學生的所有活動，上海的中國商人對日態度業已分歧。雖然上海總商會表示對年輕學者的同情，早先却也表示過幾分親日的觀點。這受到「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」和報界的猛烈批評，其中包括了「每週評論」上陳獨秀的社論。中國商人專賣日貨的自遭嚴重的財務損失，不過，在當時的同行中，他們只屬於極少數。

無論如何，這七天的罷市估計使商人損失二千萬元以上——好在可用其他因素來彌補。在戰時短暫的繁榮以後，中國便面臨了一個市場問題。隨着鄉村經濟的逐漸崩潰，廣大農業人口的購買力頗見衰退，商人和本地工業家都面臨著這個難題。排斥日貨於市場之外，並勸導購買國貨以爲抵制，不論這是否基本解決之道，實際上帶來了暫時的救濟。到了五月底，本國產品的價格顯示出升高的跡象，這是學生運動的結果。

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

第一屆得獎作品

- 少年小說組第一名 定價三〇元
山裏的日子 林立文／王庭玫圖
- 兒童詩歌組第一名 定價三五元
媽媽的心·春 黃基博·謝武彰文／趙國宗圖
- 兒童詩集佳作選 定價三〇元
景翔編選
- 圖畫故事組第一名（共兩名）
（一）奇奇貓 定價二五元
黃錦堂圖文
- （二）妹妹在那裏？ 定價三〇元
劉宗銘圖文
- 全套一五〇元
五冊合購一三〇元